

文化视角

欧阳修《与高司谏书》发覆

胡 旭

内容提要:《与高司谏书》是欧阳修的散文名作,影响深远,其指斥对象高若讷因之而背上千载骂名。然而,仔细考察相关历史记载,高若讷不仅算不得奸佞,而且还较有胆识,有一定的正义感。与高若讷同时或稍后的北宋著名官员,普遍给予高若讷很高的评价。高若讷与范仲淹只是政见不同,并没有与宰相吕夷简结为朋党,排斥范仲淹。欧阳修之所以痛责高若讷,一方面是因为他不了解范仲淹被贬的真实原因,另一方面是他家庭遭遇极端不幸,本来就比较情绪化的他,因此变得更加偏激。但是,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修养的加深,欧阳修对自己早年的行为有一定反省,后人顶礼膜拜的《与高司谏书》,不仅不让他引以为荣,相反让他感到羞惭。

关键词:欧阳修 高若讷 《与高司谏书》 发覆

欧阳修是中国历史上极负盛名的文人学者,除了文学、史学、经学等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之外,他的疾恶如仇和正直敢言,也受到后人的无限景仰。最能体现这一品质的,通常认为是他的名文《与高司谏书》。此文在20世纪60年代初被选入朱东润先生主编的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》,并因此书的大量印行而广为流布。然编选者称此文“理直气壮,文辞虽婉转而极犀利”^①,显然着眼于文章本身的艺术成就,并没有对高若讷的人品作出太多主观评判。可是,在另外一些古代文学史和古代文学作品选中,因弘扬欧阳修正直敢言之精神而对高若讷进行负面评价者,屡见不鲜。如程千帆、吴新雷二先生合著之《两宋文学史》云此文“尖锐揭露了高若讷卑劣的灵魂”^②,赵义山、李修生二先生主编之《中国分体文学史》散文卷云此文最终将高若讷“可鄙的形象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”^③,袁行霈先生主编之《中国文学史》第四卷云此文“揭露、批评高若讷在政治上见风使舵的卑劣行为”^④。此类观点多来自著名学者,影响十分广泛,高若讷作为奸佞小人的形象,越来越深入人心。但历史常常是被尘封的,表相每与事实有一定的出入。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,不仅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失客观、公正,而且也容易进一步掩盖事情的真相。有鉴于此,对《与高司谏书》一文作尽量符合实际的背景解读与人物评价,显得非常必要。

① 朱东润主编: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》,中华书局,1964年,第876页。

② 程千帆、吴新雷:《两宋文学史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1年,第40页。

③ 赵义山、李修生主编:《中国分体文学史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年,第150页。

④ 袁行霈主编:《中国文学史》,高等教育出版社,2005年,第43页。

一 高若讷算不得奸佞之徒

《与高司谏书》有数处直接为高若讷定性的话,如“知足下非君子也”、“君子之贼也”、“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”等,盛气凌人,语近谩骂。高若讷的为人究竟如何,不应光凭欧阳修情绪激动时的言辞来判断,应该结合他一生的主要行事,进行综合、全面的评价。

高若讷字敏之,十岁丧父,勤学自励,进士及第。历官著作佐郎、太常博士、左司谏、起居舍人知谏院、天章阁待制、河东路都转运使、龙图阁直学士、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、参知政事、枢密使等。高若讷一生中,可观其品节的,除了在吕、范之争中不置一辞而遭欧阳修痛责外,尚有若干事,兹择要论之。

一是奏抑王蒙正。《宋史·高若讷传》云,王蒙正知蔡州时,高若讷上疏云:“蒙正起裨贩,因缘戚里得官。向徙郴州,物论犹不平,今予之大州,可乎?”这个奏疏被宋仁宗压下了,不予理会。王蒙正是什么人?宋人王明清《挥尘后录》卷二云:

昭陵聘后蜀中。有王氏女,姿色冠世,入京备选。章献一见以为妖艳太甚,恐不利于少主,乃以嫁其侄从德,而择郭后位中宫,上终不乐之。王氏之父蒙正,由刘氏姻党,履典名藩。未几,从德卒,至是,中批王氏封遂国夫人,许入禁中。

王蒙正是一个靠裙带关系而得典州郡的平庸小人,诸史关于其凭借与章献太后的姻亲关系而横行不法的记载很多。高若讷明知王蒙正的关系背景^①,却敢上疏奏请贬抑,可见他不是没有正义感的,而且也有一定的胆识。

二是奏出阎文应。《宋史·高若讷传》云,阎文应为入内都知,高若讷言其肆横不法,请出之,遂出文应为相州兵马钤辖。阎文应是仁宗近侍,与吕夷简关系密切。此人屡屡参与宫廷斗争,在后妃废立上,每上下其手,做了不少坏事。高若讷谏出此人,是需要一定勇气的,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等于从宫中赶走了吕夷简的耳目。欧阳修说高若讷阿附吕夷简,至少在这一件事上是无法解释的。还有一事值得注意,范仲淹为开封府尹时,因阎文应涉嫌谋害郭后,亦上书劾奏,流阎文应于岭南,死于道。就此事来看,高若讷与范仲淹并非事事掣肘,也有一致的地方。

三是奏罢贾昌朝和吴育。《东都事略》卷六十三、《宋史·高若讷传》云,贾昌朝为宰相,吴育为参知政事,二人不协,常于朝廷论争,各不相让,群臣失色。后大旱,御史中丞高若讷上奏:“大臣喧争为不肃,故雨不时若。”于是二人皆罢。贾、吴二人之所以敢在朝廷有恃无恐地争吵,显然是各有所倚的。高若讷并没有倾向于哪一方,可见他并不骑墙。敢于奏罢宰相、副宰相,可见其不畏权势。^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贾昌朝在范仲淹新政失败后,落井下石,成为迫害范仲淹和革新派的主要人物。高若讷奏罢贾昌朝,而不与其沆瀣一气,可见他人格上不乏让人佩服之处。

四是议讨王则及杀张得一。《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》卷四十九、《宋史·高若讷传》皆云,王则据贝州为乱时,官军讨逾月未下。或议招降,若讷言:“河朔重兵所积,今释不讨,后且启乱阶。”及破城,知

^① 王百川《太平治迹统类》卷二十九、李幼武《宋名臣言行录·后集》卷二、徐乾学《资治通鉴后编》卷四十九皆云王蒙正之女(即刘从德之妻)常出入于宫廷,得幸于仁宗。

^② 王称《东都事略》卷六十三、《宋史·高若讷传》皆云高若讷奏罢吴育,遂代吴育为枢密副使,时论非之。按,高若讷奏罢贾、吴二人,未必有意谋取自代。《东都事略》凡谈及高若讷,多有贬词,似有感情倾向;《宋史》采择其中材料,难免有因袭之处。

州张得一送御史台劾治,朝议免死,若讷谓:“守臣不死,自当诛,况为贼屈?”得一遂弃市。高若讷反对招降王则,可以看出他的政治远见。坚持诛杀张得一,可见他很有原则,决不徇情枉法。

高若讷的为人如何,通过以上四事大致可以看得清楚。总的说来,高若讷颇有见识,不乏胆量,有一定的正义感,也不阿附权贵,他应该算不上奸佞小人。

当然,高若讷也有自身瑕疵,史载其任枢密使时出行,头前开路者曾殴打路人至死,为御史奏弹罢相。也就是说,他有御下不严的问题。枢密使是宋代实职官员的最高等级,出行时扈从之多,仪仗之盛,是不言而喻的。其中不免有骄横跋扈之徒,做出为非作歹之事。高若讷本是“畏惕少过”^①的谦谦君子,大约随着权位日盛,年龄老迈,自律亦大不如前了。此类情形,史不鲜见,张居正早年力戒奢华,何等风操,拜相后却坐着三十二人抬的豪华大轿,千里招摇。时位之移人,大抵如此。

二 高若讷与景祐革新党人的关系

欧阳修对高若讷的抨击,非常尖锐,甚至刻薄。出发点有二:一是范仲淹被贬时,身为谏官的高若讷没有出言相救;二是高若讷不仅不明别是非,而且还在背后诋诮范仲淹。这两点都可以重新讨论。

欧阳修的重要失误,是他和当时的很多人一样,不知道范仲淹被贬官的真实原因。而且,他对范仲淹与吕夷简之间那种时而冲突、时而合作的关系,也不太理解。

范仲淹和吕夷简的矛盾,表现在三个层面。第一,景祐三年(1036),范仲淹绘制了一张百官图,呈上宋仁宗,对宰相吕夷简的用人制度,提出尖锐的批评。吕夷简因此恼怒。第二,宋仁宗是一个颇想作为的君主,他觉得都城汴梁无险可守,于是范仲淹力主建洛阳为陪都,吕夷简认为此论迂阔,建议以大名为陪都,二人你来我往,唇枪舌剑,各不相让。第三,范仲淹在与吕夷简的斗争中,言语十分极端,他将吕夷简比作西汉末促成王莽乱政的张禹,认为吕夷简也会败坏赵宋王朝的家法。吕夷简则让侍御史韩渎将范仲淹的朋党姓名全部列出,张布于朝堂。范仲淹也以更加尖锐的言辞回击。后代史书言及以上三事,多站在范仲淹的立场上。但客观而言,吕、范之争,是非并不像后人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在这些斗争中,范仲淹大多是进攻者,吕夷简主要是防御者。范仲淹的某些攻击,如果得到宋仁宗认可,都足以致吕夷简死命。但是,宋仁宗将范仲淹贬为饶州知州。

范仲淹被贬的原因,显然与吕夷简斗争的失败有关,却不是主要原因。虽然敕词中说他自结朋党,妄为荐引,但真正的原因不好公开,宋仁宗数年后才私下道出。《宋史·范仲淹传》记其事云:

仲淹既去,士大夫为论荐者不已。仁宗谓宰相张士逊曰:“向贬仲淹,为其密请建立皇太弟故也。今朋党称荐,如此奈何?”

如果把宋仁宗看作一个完全任权臣摆布的君主,这是一个十足的错误。范仲淹实在太过忠于赵宋王朝的帝统,而不顾及宋仁宗没有子嗣的尴尬,他秘密请立“皇太弟”的行为,刺伤了时年四十六岁的宋仁宗的自尊心。范仲淹显然知道自己被贬的症结所在,所以并不多怪吕夷简。若干年后,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,吕夷简仍为宰相,宋仁宗欲使他们冰释前嫌,范仲淹说得非常爽快:“臣向论盖国家事,与夷简无憾也。”^②这句话是有深意的,他并不认为吕夷简是他贬官的主要原因。而更说明问题

^① 《宋史·高若讷传》。

^② 邵经邦《弘简录》卷一百四。

的,是吕夷简死后,范仲淹为他写的祭文:

呜呼,富贵之位,进退惟艰;君臣之际,始终尤难。公觐昌辰,宰予庶揆,保辅两宫,讎谋二纪,云龙协心,股肱同体,万国久宁,雍容道行。四鄙多故,忧劳疾生,辞去台衡,命登公衮,以养高年,如处嘉遁。呜呼,日月迭来,数不可回,两楹告兆,万乘兴哀。某素游大钧,猥居近辅,得公遗书,适在边土,就哭不逮,追想无穷,心存目断,千里悲风。尚飨!

吕夷简死时,范仲淹在边地戍守,不写这篇祭文,是完全可以的。但他写了,而且给予吕夷简足够伟大的评价,甚至不惜颠覆自己当年坚持的一些观点。可见,范、吕之间的分歧,一定程度上是君子之争,并没有太多地伤害彼此感情。

由于范仲淹请立皇太弟一事是秘密进行的,因而他被贬官的真正原因,革新派同党并不清楚。由于理解的错误,他们觉得范仲淹受了委屈,试图要为他讨回公道。第一个挺身而出的是余靖,他上疏云:“仲淹以刺讥大臣重加谴谪,倘其言未合圣虑,在陛下听与不听耳,安可以为罪乎?汲黯在廷,以平津为多诈,张昭论将,以鲁肃为粗疏。汉皇、吴主熟闻訾毁,两用无猜,岂损令德。陛下自亲政以来,屦逐言事者,恐钳天下口,不可。”^①此疏情绪激动,措辞严厉,加上不明就里,使气任性,余靖立刻被贬外放。其次出面的是尹洙,他上疏云:“仲淹若以他事被谴,臣固无预,今睹勅意,乃以朋比得罪,臣与仲淹义分既厚,纵不被荐论,犹当从坐,况如众论?”虽然十分谦恭,却依然不明圣心,于是亦被贬官外放。

余靖挑皇帝的错,尹洙自我检讨,结果殊途同归。欧阳修勃然大怒,但他把一腔怒火发在左司谏高若讷身上,认为他阿附吕夷简,不敢主持正义。其实欧阳修与高若讷是通过尹洙、余靖,才有一点交往,但谈不上相知。尹洙、余靖和高若讷皆同年及第,相知较深。欧阳修向尹洙了解高若讷时,尹洙的评价是“正直有学问,君子人也”。正因为与余靖、尹洙常相交往,高若讷才在他们面前把自己对范仲淹的不满表达出来。尹、余二人并没有对高若讷的言辞做出什么特别的反应,可能在他们看来,无非是政见不同而已。范仲淹颇具纵横家气质,有时难免出现倜傥直躁竞的倾向。相对而言,高若讷更像一个醇儒,有板有眼,一丝不苟。高若讷身为谏官不为范仲淹说话,却诋诮范仲淹,大约他确实反对范仲淹的一些做法,但出乎他意料的是,这引起了欧阳修的愤怒。当欧阳修对他大张挞伐的时候,高若讷显然没有思想准备,反应也显得过激,他将《与高司谏书》上呈宋仁宗,欧阳修被贬遂成为必然。经过这样一番闹腾,朝野议论纷纷,年轻气盛的蔡襄写了《四贤一不肖》诗,谓范仲淹、余靖、尹洙、欧阳修为四贤,高若讷为不肖。此诗适应了当时的社会气氛,流传甚广,但要说蔡襄怎么正义在身,可能也不客观。他的行为,相当程度上是为欧阳修打抱不平,他们同科及第,此时又同为馆阁校勘,声气相应,原亦在情理之中。蔡襄的诗是私下流传的,后来有泗州通判陈恢觉得此诗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,上书请求追究作诗者,时任右司谏的韩琦弹劾陈恢越职言事,蔡襄之事才作罢。韩琦与蔡襄皆闽人,关系甚密,韩琦本人实际也是范仲淹的革新派成员,故关键时刻出手相救。

高若讷与景祐革新党人的关系比较复杂。他与范仲淹政见不同,对范仲淹的思想、行为亦不认同,认为范仲淹被贬为饶州知州,是适度的惩罚。但他并没有在背后做什么动作,他的官太小,介入此事的实际能力很有限。说他阿附吕夷简,只不过是欧阳修的猜测而已,并没有任何实质根据。高若讷与余靖、尹洙关系密切,私下往来很多,可以推心置腹地交流时事。他们政治观点、立场虽未必一致,但不影响彼此的友谊。余、尹二人在为范仲淹喊冤时,也没有牵扯上高若讷,可能他们也知道,问

^①《宋史·余靖传》。

题的症结不在高若讷身上。高若讷与欧阳修交情很浅,是因为尹洙和余靖的关系,才有了一点交往。以欧阳修年轻时愤激、疏狂的个性和一向平稳、谨慎的高若讷,或许是素不相能的。欧阳修和蔡襄不向皇帝宣战,不向宰相宣战,而把火力集中向官仅七品的左司谏高若讷,实际上瞄错了目标。他们的目的,可能就是出一口恶气而已,高若讷不幸成为他们的出气筒。

三 北宋著名官员眼中的高若讷

范仲淹的思想、行为虽时有矫激,但他确实是胸怀宽广、处世灵活的人。他不仅能相对正确地看待吕夷简^①,也不计较高若讷当年与他的政见分歧。关于当年欧阳修痛责高若讷而导致二人失和一事,他后来是这样评价的:

往者缘臣之罪,有黷朝听,盖本人素好议论,闻于缙绅,只如臣为谏官之初,杜衍任中丞之日,修皆曾移书责臣等缄默无执,非独有高若讷之让也。以此明之,实非朋党。若讷知其无他,亦常追悔。^②

这是范仲淹想提拔欧阳修到自己跟前做官的奏疏,言辞很值得玩味。云“缘臣之罪”等于承认自己当年错了。云“有黷朝听”,无异于说欧阳修的《与高司谏书》影响恶劣。而且,范仲淹把欧阳修对高若讷的攻击等同于对自己和杜衍的批评,认为这是欧阳修好议论的性格所致。最后一句特别关键,说高若讷最终也知道欧阳修是个什么样的人,常常为自己把欧阳修攻击自己的《与高司谏书》上交给宋仁宗导致后者被贬而追悔。

范仲淹本欲举荐欧阳修,可他一不小心把当年事件做了一个评价,欧阳修成了一个爱冲动、好议论的楞头青,高若讷则成了一个为人厚道、常怀恻隐之心的君子。这个评价并不是范仲淹这封荐书的主题,但对当年事件的评价态度,却令欧阳修非常尴尬,他拒绝了范仲淹的举荐。范仲淹与吕夷简后来和好,一定程度上是对欧阳修当年冲动行为的否定,这也是欧阳修长久不能释怀之事。

与高若讷同时的北宋著名官员中,对高若讷有好感的正直之士并不鲜见。如宋祁在北宋官员中声望甚高,与范仲淹为至交,与欧阳修同修《新唐书》,关系也非常密切^③。然而,庆历年间宋祁由龙图阁直学士升任翰林学士时,按照规定,可以举一人自代,宋祁就举了高若讷。他的《授翰林学士高若讷自代状》云:

右臣蒙恩,除授翰林学士,准敕举官自代者。窃见前天章阁待制高若讷,资性谨厚,文词淹敏,值物照理,物无度情。与臣偕第同班,稔其履尚,若擢置近署,足润大猷,愿回新命,以光清授。^④

宋祁对高若讷的评价很高,认为他厚重谨慎,才高学博,精于典章,明于事理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宋

^① 庆历年间,范仲淹戍守边关时,有若干篇《上吕相公书》,甚为诚恳。然吕夷简气量亦大,以国事为重,未斤斤于个人恩怨。

^② 范仲淹《举欧阳修充经略掌书记状》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《范文正集》卷十八。

^③ 欧阳修与宋祁不仅合作修撰《新唐书》,生活中也互相卫护。宋祁晚年知益州,奢华过度,为包拯所劾,欧阳修为此还作《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》批评包拯。

^④ 宋祁《景文集》卷三十,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。

祁和吕夷简矛盾甚深,吕夷简曾指责宋祁、范仲淹结为朋党。如果高若讷像欧阳修所说的那样阿附吕夷简,宋祁能举他自代吗?高若讷死后,宋祁为他写了墓志铭,对他的一生,更是做了高度的褒扬。

韩维为官清正,在北宋士林中有很好的口碑。高若讷死后,韩维写了三首诗悼念他,第一首云:

群经分上下,大节凛终初。国仰谟猷在,人传论议余。
藏家惟古器,纳壑或奇书。儒者哀荣极,临觞降玉舆。^①

这首诗对高若讷的评价非常高。首联说高若讷深通儒学,品节高尚且始终如一。颔联云高若讷的治国方略和上书言事为人景仰,让人传诵。颈联云高若讷情趣高雅,酷爱古玩奇书。尾联云高若讷死后备极哀荣,皇帝也亲临祭奠。另外两首比起这一首来,书面的表彰少一些,然怀念之情更切。显然,在韩维看来,高若讷在名节、学问、际遇等方面,都是士人的表率。

颇为吊诡的是,韩维是欧阳修非常赏识的人,他在庆历年间知太常礼院,就是欧阳修推荐的。这也许也能说明《与高司谏书》对高若讷的抨击,意气用事的成分很多,不见得是客观的。

苏颂是北宋一位非常正直而又极讲原则的官员,无论在当时,还是后世,都有良好的声誉。高若讷死后的谥号,就是苏颂的建议。在《赠右仆射高若讷谥文庄》一文中,他对高若讷给予了极高的评价:

仆射纯学懿行,著于州里,显于朝廷,而称于士大夫。……谥法曰:“博闻多见曰文,履正志和曰庄。”若夫学通古今,而长于辩论,是为博闻;识造贤达,而明治要,是为多见;值贵幸之势,而抗议毋挠,是为履正;当功名之途,而处之不争,是为志和。以一惠之大,配二字之美,谥兹遗德,实惟至公,请谥曰文庄。^②

“文庄”这一谥号,是从才学和品德两方面做出的评价。^③文中还列举了不少依据,限于篇幅,此处不赘。高若讷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,从中不难得出答案。

除了欧阳修和蔡襄在景祐年间痛骂高若讷外,现存典籍中很难找到北宋士人恶评高若讷的文字。唯一的记载是王曾评价当时的奏疏云:“向来如高若讷辈多是择利,范希文亦未免近名,要须纯意于国家事尔。”^④这话带有批评的色彩,把高若讷和范仲淹都带上了。王曾平素沉默寡言,望重当时,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。

四 欧阳修的家庭不幸与《与高司谏书》

读《与高司谏书》一文,可以看出欧阳修写此文时情绪激动,言辞失控,似乎欠缺儒家一向强调的养气功夫。须知,范仲淹并没有被杀头,仅仅是贬为饶州知州,当事人都很平静,犯得着欧阳修发这么大的肝火吗?有没有政治之外的原因呢?回答是肯定的。

^① 韩维《仆射高文庄挽辞三首》,《南阳集》卷十二。

^② 苏颂《苏魏公集》卷二十,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^③ 南宋魏了翁《奏乞早定周程三先生谥议》列举两宋时期谥号之名实不符者,高若讷亦在其中。此似欧阳修《与高司谏书》影响所致,不足为据。

^④ 王岩叟《忠献韩魏王家传》卷一。

作《与高司谏书》前二三年来,是欧阳修一生中家庭生活最为不幸的时期。明道二年(1033)正月,欧阳修因公务至京,顺便南下随州,看望叔父,三月方归来。在此期间,家中发生了一些大事,先是妻子胥氏生子,接着产后致疾身亡。欧阳修到家时,听闻一片哭声。此事对他的打击很大,可能不只是伤心,更多是悔愧。欧阳修一家,到他这一代时,因父亲早逝,门庭孤单。有同父异母兄一,年岁长欧阳修甚多,居荆州,或云其母为出妇。^①同母兄一,未卒岁而亡。^②有妹一人,已嫁人。也就是说,年仅十七岁的胥氏分娩前后,家中只有老母亲一人照应。这样的時候,欧阳修本不应该在外地留连。胥氏产后致疾,固然有多重原因,但人手不足,家中没有主心骨,当是不容忽视的因素,欧阳修本人难辞其咎。他有一首《绿竹堂独饮》,其中有云:

忆予驱马别家去,去时柳陌东风高。楚乡留滞一千里,归来落尽李与桃。残花不共一日看,东风送哭声嗷嗷。洛池不见青春色,白杨但有风萧萧。……愁填胸中若山积,虽欲强饮如沃焦。乃判自古英壮气,不有此恨如何消。

懊恼抑郁,块垒山积,欧阳修因此借酒浇愁。这样一段煎熬后,他自己又因伤致疾,心情十分晦暗。他的《暇日雨后绿竹堂独居兼简府中诸僚》云:“骑省悼亡后,漳滨多病身。南窗若可傲,方事陶潜巾。”激昂如欧阳修者,居然有归隐之意,可见妻丧对他的打击是很大的。

当然,欧阳修没有归隐,景祐元年(1034)十二月,欧阳修又续娶了杨氏。然而,仅仅过了半年相对平静的生活后,家庭再起变故。景祐二年(1035)七月,欧阳修同母妹之夫张龟正病故,妹与龟正前妻所生女孤独无依,凄惶而归。九月,杨氏去世,年仅十八。欧阳修有《送张屯田归洛歌》云:“季秋九月予丧妇,十月厌厌成病躯。端居移病新城下,日不出门无过者。独行时欲强高歌,一曲未终双涕洒。”心情衰飒颓丧,可想而知。

欧阳修在多重家庭变故的打击下,身心俱伤,胸中郁结的一股股不平之气,时时寻找着突破口。杨氏丧后两个月,朝廷诏录五代及诸国后,时御史台辟石介为主簿,介未至,即作《论朱梁刘汉不当求其后裔》。时御史中丞为杜衍,见石介未之官即轻发议论,遂将其罢免。石介和蔡襄一样,与欧阳修同科及第,气性相类,个性极端,取名“石介”,名实相副。欧阳修一见石介被罢,非常愤怒,上书杜衍云:“主簿于台中,非言事官。介足未履台门之阙,已用言事见罢,可谓正直刚明不畏避矣。度介之才,不止为主簿,直可为御史。今黜介而他举,亦必择贤。夫贤者固好辨,又有言则,又黜而他举乎?如此则必得愚暗懦默者而后止也。”杜衍在年龄上是欧阳修的前辈,在官职上是欧阳修的上级,连范仲淹都对杜衍尊敬有加,常“以父事衍”。^③可是欧阳修却冲这么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发泄不满,而且言辞过激。杜衍当然不为所动,但此人气量甚大,并没有跟欧阳修过不去,这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他遇事便发、轻肆直言、以下犯上的毛病。

石介之事让欧阳修碰了一鼻子灰,心情越发郁闷。次年即发生了范仲淹贬饶州知州一事,欧阳修再也无法容忍,冲天怨气喷薄而出。《与高司谏书》意气之劲,文笔之锐,在北宋之文中,几无能出其右者。许多研究者把欧阳修切责高若讷的行为,归结为个性刚正,这显然有一定的道理,但丧妻以及其他方面的失意,使欧阳修本来就偏于矫激的思想更加极端,这是此文成因中不可忽略的因素。

① 刘德清:《欧阳修纪年录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6年,第7页。

② 孔平仲《谈苑》卷三:“永叔尝自言,上有一兄,未晬而卒。”(《四库全书》本)

③ 陈均《宋九朝编年备要·皇朝编年备要》卷十二。

五 晚年欧阳修不以《与高司谏书》为荣

单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《与高司谏书》确实气势逼人 酣畅淋漓 极具感染力。后人多被此文吸引 如宋黄庭坚云：“观欧阳文忠公在馆阁时《与高司谏书》，语气可以折冲万里。”^① 清陆继辂书欧阳公《与高司谏书》后云：“愿录此文一通，烧灰和酒饮之，名曰‘刚肠散’。”^② 今人于此文，更是仰之弥高，奉为经典，颂扬之语，难以尽述。

然而，欧阳修自己生前编定的文集《居士集》^③中并没有收录《与高司谏书》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晚年欧阳修不以此文为荣，对当年攻击高若讷的行为，思想认识上已经有了很大变化。极其崇拜欧阳修的吴充，在为他作《行状》^④时，在长达四千五百余字的篇幅中，于此事寥寥数字，一带而过，不事臧否，这或许是能说明问题的。

更能说明问题的是，欧阳修为蔡襄所作的《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》^⑤中，绝口不提他与自己共同攻击高若讷时作《四贤一不肖诗》之事。而且，宋人所见蔡襄《端明集》中，也不收《四贤一不肖诗》。王十朋云：“某初见其诗于张唐英撰《仁宗政要》，甚歆慕之。其后见公文集，乃没而不载，窃以为恨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谈及早期《端明集》不收蔡襄《四贤一不肖诗》等五篇作品时，是这样分析的：

宋代之制，虽小臣亦得上书，襄既以朝廷赏罚为不公，何难稽首青蒲，正言悟主？乃仅作为歌诗，使万口流传，貶侮邻国，于事理尤为不宜。襄平生著作，确有可传，惟此五篇，不可为训。欧阳修作襄《墓志》，削此一事不书，其自编《居士集》，亦削去《与高司谏书》不载，岂非晚年客气渐平，知其过当欤！

四库馆臣的议论，今天看来虽略显迂阔，但还是说到了问题的本质，即晚年的欧阳修和蔡襄，生活逐渐平静，家庭也已安稳，修养越来越深，那种慷慨激昂、气冲斗牛的血气也渐渐消弭。静心回首往事，当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意气太过、有失客观时，难免生出一二惭愧之意和追悔之心，編集时排除此类文章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

然而，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爱惜自己的羽毛。欧阳修一直以儒者自居，以韩愈为表率，韩愈则把孟子的养气传统进行了发扬光大。很显然，青年时期的欧阳修，容易冲动，过于好辩，每违儒家宗旨。《与高司谏书》就是此类言行的典型代表，如果流传后世，不免为人所讥，破坏自己的形象。清王元启论韩愈《送陆歙州》一文言辞优雅从容时，顺便评价欧阳修之文云：

此等处极为可法，后惟欧公深得此旨。如《岷山亭记》、《辞范龙图辟命》、与乐秀才、答宋咸诸《书》，竟体温和含蓄，无一语触戾。他如范司谏、高若讷、石推官诸《书》，集中皆删去，盖自以所养未粹故也，后人知此意者鲜矣。^⑥

① 黄庭坚《跋欧阳公红梨花诗》，《豫章黄先生文集》第三十。

② 陆继辂《刚肠散》，《合肥学舍札记》卷二。

③ 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文忠集》云：“《宋史·艺文志》载修所著《文集》五十卷、《别集》二十卷、《六一集》七卷、《奏议》十八卷、《内外制集》十一卷、《从谏集》八卷，诸集之中惟《居士集》为修晚年所自编，其余皆出后人裒辑，各自流传。”

④ 《文忠集·附录》。

⑤ 《文忠集》卷三十五。

⑥ 王元启《读韩记疑》卷六。

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。不可否认,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加深,加上个人有意识的追求,欧阳修的价值观念和处世方式都在变化,儒家温柔敦厚的传统观念在他晚年的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。正因为如此,《与高司谏书》不仅不能让他引以为荣,相反会让他觉得羞惭,所以他并不愿意将其收入亲手所编的文集中。

欧阳修的文学成就极高,在后世名声越来越大,作品备受关注。著名选本如明代王顺之的《文编》、茅坤的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、清《御选唐宋文醇》皆从文章学角度选录《与高司谏书》,此文影响遂越来越大。高若讷则因此文的广泛传播,演变成一个反面文学形象,遭人唾骂。个中是非,令人嗟叹。

(胡旭,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)

国内首家权威专业书评媒体 中国社会科学检索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

《中国图书评论》(月刊)2012年第3期要目

近期出版社推荐图书

张 柠、曾念长 阅读和记忆的重建

江晓原 2011年度科学文化好书八种

周志强 陌生人时代的中国

张 岩 陌生人社会的法与德

陶 然 “陌生人社会”,现实抑或话语策略?

方维规 “全球化”始于何时?——“现代世界的诞生”和“世界之变”

曹亚瑟 文学的等候——期待译成中文的十部小说

郭 栋 “洛丽塔”:小说·电影·德黑兰的纳菲西

汪 亮 当英国博物学家来到中国

刘祥和 畅销书,果真可遇不可求吗?

陈 洪 金贵百炼,研重实学——评何宗美《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》

高一然 在读图时代遭遇“绘本热”

窦 薇 挣不开的情网恢恢:你焉识那样的时代

总编:杨平 执行主编:周志强

地址:北京市朝阳区春秀路太平庄10号中国图书评论杂志社 邮编:100027

电话/传真:010-64173406 邮箱:chinabookreview@163.com

国外代号:M1029 ISSN1002-235X 国内代号:CN21-1035/G2 国内邮发代号:8-46

每期128页,每月10日出刊,定价12.00元,全年144元

全国各地邮局订阅、编辑部办理邮购